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历史演进与主要启示^{*}

史小宁

提 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运转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从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历了从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型意识形态向治理型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一过程昭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导向、坚持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的整体视角、坚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工作 历史演进 主要启示

作者史小宁，男，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云亭青年教授，法学博士（兰州 730070）。

意识形态工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举措，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显著优势的重要标识。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随着国家建设从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其意识形态工作也经历了从强调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型意识形态向治理型意识形态的转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就如何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尊重社会意识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甚至出现了阶段性的曲折，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才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 21 世纪的中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党始终在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并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19JD710082）、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研究”（YB032）、甘肃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课题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研究”（2018GXSZGZYBKT5）的阶段性成果。

定奇迹。因此,深入剖析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的现代化转型,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历史演进

意识形态不仅是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出现的旨在指导特定阶级进行实践活动,并为其目的和利益服务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是一定阶级诠释自己政治合法性的“可能性边界”和个体与社会相联系的黏合剂,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构建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思想水泥”和“精神堤坝”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就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演进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工作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和发展程度。

(一) 革命型意识形态路径惯性的继续呈现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②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强调与凸显也同样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形成与发展既存在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工作路径依赖的惯性,又是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紧握“笔杆子”,通过理论创新、舆论宣传、思想动员,为革命胜利凝聚力量。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政党转变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因此,如何将党的政治主张、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实现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变,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京赶考”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毛泽东更加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④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页。

但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必须符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一方面从国际形势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基本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等措施,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随后又公然发动朝鲜战争,威胁中国安全,这迫使我们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和打破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图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很快随着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和揭露,中苏围绕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这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夸大“阶级斗争”和强化“革命惯性”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从国内形势来看,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影响强烈;在经济上,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以及各种经济成分的相互并存,致使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在文化上,教育文化事业极度落后,各种旧的思想观念仍然在党内、思想界、文艺界蔓延盛行,不适应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需要。这极大地造成了思想观念领域错综复杂的局面。

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第一,各地成立马列学院(党校),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1948年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后来改名为中央直属党校,专门负责党政领导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任务。各地也建立自己的党校,部分高等学院增设了“马列教研室”“政治系”等。第二,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人员翻译出版马列著作。1953年经中央批准,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宣部有关部门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第三,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因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①等等。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种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路径惯性并未因此消弭,反而呈现出不断被强化的迹象,致使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到1976年间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一度出现了曲折和失误。首先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的无限夸大,主张要用意识形态来统领一切,认为仅仅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脱离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成为一种与现实彻底断裂的思想呓语。其次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跟已有的各种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体系实行最彻底、最革命的决裂,这严重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原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会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不仅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而且还“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最后表现为对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放弃,认为现存社会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都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是阶级矛盾，必须通过“革命化”的方式来解决，致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都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当时，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与敌对势力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是完全有必要的，对于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国内主要任务已经发生转化的背景下，仍然强化意识形态的革命型叙事就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单一政治功能，导致以“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左”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肆意盛行。这一方面加大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的反思与认识。

（二）建设型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的逐渐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逐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快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全方位的开放使我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快速的社会转型则使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等日益多样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已经无法适应现实政治实践的需要，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社会现实做出主动的调整，实现“革命型意识形态”向“建设型意识形态”的自觉转变。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公开发表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由“革命型”向“建设型”转变的思想先导。一时之间，围绕“要不要解放思想”“如何解放思想”的争论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焦点。对此，邓小平谈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②，坚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和“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不断赋予其新的建设内容。比如立足于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提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三个有利于标准”“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一系列建设话语体系。这说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开始关注以“发展”话语为基点的政治目的，而且开始转向关注生活目的的价值理性并且力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曲折。一些西方学者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并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进入世纪之交，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但“强权政治”“恐怖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3页。

④ 参见王永贵：《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学海》，2017年第6期。

义”“地区冲突”等新的冲突又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人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产生了动摇。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性事件，极大地增强了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他指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正确制定和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发展先进思想、克服落后思想。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这是绝不允许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①党的十六、十七大以来，我们党面对现代化、工业化的步伐还未完成，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城乡发展“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地区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凸显等新问题，继续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积极探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有效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认识到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充满自信地对外宣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③这四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充分显示了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的深刻变革。

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以“强调发展”为特征的建设型意识形态工作机制逐渐被确立起来。比如，在意识形态建设内核方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在意识形态建设载体方面，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承载着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在意识形态建设目的方面，指出意识形态建设要服务于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稳定的大局；在意识形态建设内容方面，开始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主线；在意识形态建设成效评判方面，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对意识形态工作判断的根本标准，等等。^④

（三）治理型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制度定型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每一次变革性推进与调适性转型，不仅是对以往意识形态工作及其实践经验教训理性总结的结果，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新问题、新矛盾、新要求现实回应的结果。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强调阶级性、斗争性为特征的革命型意识形态，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则逐渐演变为以“强调发展”为特征的建设型意识形态。特别是建设型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党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更加深入人心，这说明我们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主动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3页。

③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王永贵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155页。

仍然复杂尖锐。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流、交锋更加频繁，“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渗透遏制”，“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这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多元化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显著增强，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成为常态”。^①

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特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时之间这个发端于西方语境中的“治理”概念成为了我国政治生活领域中的高频词汇，并逐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治理思想。^②这在客观上使社会治理理念向意识形态领域延展成为必然。因为，当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再仅仅拘泥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面，而是着眼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话语创新，这就必然上升到政治的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层面，使意识形态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治理型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创新与发展正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不仅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而且需要围绕现代治理理念推进治理型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

治理型意识形态与建设型意识形态相比，虽然在价值诉求上都是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但是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方式则有所侧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治理就是运用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为实现治理目标互动协作的动态过程。^③从治理主体来看，治理型意识形态更加强调“核心主导、多元参与”。以往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强调由党和政府垂直自上而下地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主体相对比较单一，现在更加注重党、政府、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主体体系建构，更加注重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不改变党的意识形态根本性质的前提下，意识形态话语也开始由以前的“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强制说教”走向“多元共治”，“宏大叙事”走向“日常生活叙事”。从治理客体来看，治理型意识形态面对的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而是多元构成的社会总体，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在具体意识形态工作过程中，每一领域又会细化为许多方面，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耦合，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治理的全貌。从治理方向来看，治理型意识形态就是要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基础上，不断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之成为彰显“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一显著优势的制度保证，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基本、更持久的思想基础。这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15页。

② 参见杨仁忠、赵梦宸：《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理念的基本意蕴及其创新价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③ 参见范美香：《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使命担当与实现路径》，《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领域对党的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比如，在文艺创作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①。在新闻舆论方面，强调“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自由”，“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②在网络安全方面，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必须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行为，绝不能让其肆意蔓延。^③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④。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⑤等等。

沿着这一轨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层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加以制度化的确定，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在新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趋势。

二、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变革和发展，实现了由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型意识形态向治理型意识形态的转变，使“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⑥，开创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境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道路，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旗帜和灵魂，它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⑦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进程表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时

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页。

②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332、336页。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⑤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⑦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积累的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践也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完全正确的。^①只有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性价值的充分实现。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任务艰巨，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快速持续稳定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文化等优势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然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因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入手”^②。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各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诋毁甚至否定的声音不断涌现。在这里，我们必须厘清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等同于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二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对立。对于这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明确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确实对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思想解放以及推动理论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社会都必须以有序的多样化为前提，也就是说，既要允许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际上与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并不矛盾，它不仅不会影响我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不会影响我们去吸收或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这使它具备了既能包容差异又能坚持立场的特点。

因此，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我们仍然必须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其制度形态和发挥其治理效能。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④。

（二）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导向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导向，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体现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相结合。前者重点解决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属性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等问题，后者主要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群众基础、动力之源以及出发点和落脚点等问题。这是贯穿于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①④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6、35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第一，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原则。“党性”即党派性、派别性，它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特性和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②。由此可见，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澄清各种错误思想的消极影响，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党性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的经验总结。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领导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领导，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属性和服务方向；在思想领导方面，利用国家舆论机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澄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不断继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在组织领导上，依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以及建立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负责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牢牢掌握党在新闻出版、理论研究、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领导权，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的团结，等等。

第二，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立场。任何社会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卓越理论思维的呈现，能否真正体现对现实的诠释功能和导向功能，关键在于它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还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凝聚民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 and 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③。治理型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制度定型，就更加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坚守人民立场、彰显人民情怀的现实价值。这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既是意识形态治理的价值主体，又是实现其价值的实践主体。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维护和创新之中。另一方面说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只有实现对人民利益诉求的关注、回应和满足，运用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它才会真正获得“普遍性”的价值支撑和体现人民利益至上的崇高道义。

当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内在一致的、相互统一的，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也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意识形态工作只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导向，才能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形成有效的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机制。

（三）坚持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的整体视角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固有特性和本质属性，它不仅要求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上的整体性、意识形态实践维度上的整体性，更要求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整体性。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②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194页。

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但理论如何被群众信服和掌握,如何抓住事物的根本,不仅需要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彻底,更需要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上的科学,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尊重其工作的规律性,坚持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的整体视角。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比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等。在这些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对待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视角,主要体现在:第一,坚持问题性与重点性相融合的方法。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是促进事物矛盾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动因。而重点性就是指要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为问题的解决寻找突破口、寻找抓手。为此,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紧紧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开出了一剂剂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良方。比如,针对党内群众意识缺失、党性与人民性不统一的问题,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校工作以及宣传思想工作弱化的现象,强调必须在坚持意识形态政治属性的原则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针对如何做好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要树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总体方针,等等。第二,坚持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的方法。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特点,这既是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所决定的,又是由中国共产党鲜明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这一显著的批判性特征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旗帜鲜明地对各种异质性的社会思潮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这种批判性特点还体现在自我批判上,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勇于不断自我反思、自我革命,才能进一步彰显意识形态工作的开放性、时代性和竞争性,进而达到有效防止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僵化的目的。当然在这里,批判只是前提性的内涵,更重要的是要在批判异质性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在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世界平台上,积极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精华和国外意识形态建设策略,真正形成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第三,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衔接的方法。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经验的前提下不断深入发展的产物。在此,我们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继承性,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过去,而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在对以往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教训反思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也不是要割断历史、割断传统、推倒重来,刻意在“革命型意识形态”“建设型意识形态”“治理型意识形态”之间制造认识上的断裂,而是要把继承性与创新性衔接起来,在选择中继承、在创新中超越,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意识形态工作。^②

(四) 坚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机制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机制,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从决策层面向执行层面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史小宁:《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

化的内在要求，是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常态化、高效化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求“迅速健全各级党的宣传机构，通过报纸、出版、广播、电影、学校及其他各种文化教育工具，经常地向各界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主张，并规定了党的宣传部门在新闻出版、广播、文化艺术以及群众宣传、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的领导职责”^①。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由于我们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没有实现意识形态工作从顶层软性要求向硬性责任约束的转变，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乘机侵蚀进来。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邓小平强调：“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②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提出要求：“党委书记主管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各级党委书记都很忙，需要抓的大事确实不少，但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③胡锦涛同志更是把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视为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这些都深刻地阐明了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机制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深刻阐释和总结概括为基础，在其系列讲话中更加强化了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科学认知，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出了制度性规定，即出台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在思想认识方面，强调各级党委及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在政治立场方面，强调各级党的组织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学术观点问题，对于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在工作作风方面，强调各级党委要不断勇于自我革命和发扬斗争精神，“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做所谓‘开明绅士’，不搞‘爱惜羽毛’那一套”^④，敢于面对各种错误观点及时亮剑；在责任归属方面，强调各级党委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具体包括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责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责任、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责任、加强网上舆论工作的责任以及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管理的责任，等等。这些论断和做法，今天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治理型意识形态建构的宝贵的经验启示。

责任编辑：凌雁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党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页。

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2页。